

## 瓷器上“春暖花开” 书画中“春意盎然”

来山东博物馆，在文物中寻找春日的浪漫吧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春光正好，微风不燥，生机勃勃的春日时节，总令人们魂牵梦绕。从古至今的匠人和艺术家们，用其满腹才情将那时那景细细雕琢，将历时春光留存至今。春天如此浪漫，何不走进山东博物馆，在文物中一览芳华，在艺术中一赏春意呢？

## 瓷器上的春天

“喜鹊昂头迎过客，声声喜语报春归。”

喜鹊报春，梅花盛开，与春日最为相得益彰的莫过于山东博物馆藏的这件清同治黄地粉彩梅鹊纹盘。此盘敞口微外撇，弧腹，圈足，足内红彩楷书“同治年制”四字款。盘内为黄地粉彩装饰，绘十六只喜鹊，寓意吉祥喜庆。盘外壁为白地粉彩折枝梅花，口沿以金彩装饰，整盘色彩艳丽，精致奢华，表现了春日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古人常将品格、思想与花木、自然相联系，为花卉赋予花德，以花喻人，赏其神骨与意境。康熙年间创烧的十二月花卉杯，将花卉与瓷韵进行完美融合。十二月花卉杯亦称为“十二月神杯”，其中二月玉兰，三月桃花，四月牡丹，正是春天的花神代表。一杯一花，一花一诗，流光溢彩的五彩十二月花卉杯将春天的唯美花信永留于世。

青花典雅与粉彩的温柔，仿佛是为春天量身定做一般，将春日里的鸟语花香描绘得灵动鲜活。这件清雅正青花粉彩花鸟扁瓶胎骨轻薄，器内外施釉，色如白脂。瓶身以粉彩绘纹饰，绘画采用了工笔画的技巧，折枝梅花、青翠竹叶与栖于枝头的喜鹊组成主题图案，辅以如意、卷草等纹。粉彩柔美，釉色匀净，让人观之如沐春风。

## 书画中的春天

“春牛图”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寓意着丰收和幸福，寄托了对春天最美的期许。过去几乎每户农家都有一幅春牛图，以便按时耕作、指导生活。它是旧时百姓民俗时空观的体现和日常生活的具体指导，也是古代人们关于春文化传承的图像记忆。

如果说春对于农家人是鲜艳热闹的，那对于文人墨客来说又会是什么样的呢？清代画家俞龄的《春游晚归图》给了我们答案。此画描绘“游春不觉归来晚，花映重门带月敲”的诗意。画中溪流流水，绿树夹岸，拱桥上一人骑马归来，二仆随行于后，其一荷担，其一负琴书；傍岸院落，花繁树茂，门前小童正敲门，背上囊中插桃花数枝。画中景物宜人，青松、碧树及院内盛开的繁花，用墨浓淡适宜，敷色沉着淡雅，无不透露着春天的气息。

“凭恃国魂魄笔墨，画魂深入寓人魂。”关于对春天的描绘，当代卓越的花鸟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于希宁先生有着自己的解读。他在绘画中强调国魂、画魂、人魂的统一，让艺术作品成为塑造、弘扬具有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之美的载体，为春日花鸟之景赋予了更宏大深远的意义。

巨制杰构《春满乾坤》是于



清同治黄地粉彩梅鹊纹盘 山东博物馆藏



20世纪50年代（清版后印）大春牛年画 山东博物馆藏



清缎地丝绣花屏四条

希宁先生经典之作，这气势磅礴的紫藤仿佛诉说着春日勃发的生命朝气，深蕴着先生关爱自然、祝福国家和人类的大爱之心，弥足珍贵。

## 刺绣里的春天

如何将春日灵动之美穿戴在身上，想必古人是最有话语权的了。山东博物馆藏白色暗花纱绣花鸟纹裙是馆藏古代服饰中的“花鸟画卷”。这件裙子最夺目耀眼之处当数其底部绣着的那一幅生机盎然的花鸟图。裙摆用红、绿、草绿、蓝、黄、黑等彩色丝线绣山石、小桥流水、牡丹、石榴花、菊花、睡莲、荷花、蜀葵、牵牛花、竹子、梅花、蝴蝶翠鸟、燕子、鸾凤等纹饰，这些生机盎然的纹饰在淡雅、微泛光泽的暗花纱衬托下，毫无杂乱之感，洋溢着—

派生机勃勃的春日祥和气息。

而这件葱绿地妆花纱蟒裙体现的是另外一种感觉的春。葱绿的主色调有着初春向暖的温柔。间饰翔凤、牡丹、茶花、菊花、荷花、梅花、海水江崖等纹饰让威严的蟒龙也变得活泼了起来，展现着春天的俏皮与灵动。

如何让春意入家来？几扇绣着花鸟的屏风最能让人身临其境，让人在家中也能如沐春光。“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高超的刺绣技巧让人分不清这春日花鸟是画还是绣，其光泽与质感让这花鸟之景更显梦幻，似闻鸟鸣，似嗅花香。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春光易逝，美景难得，与其伤春，不如在博物馆里找春天。在文物中随着历史的轴线，欣赏春的千年千面。

据“山东博物馆”公众号

□张书功

公孙弘（前200年—前121年），名弘，字季，为西汉名臣。他布衣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是西汉建立以来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为西汉后来“以丞相褒侯”开创先例。其在任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除了这些之外，史书还记载公孙弘“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牧豕海上”就是说他曾经在海上放过猪，咱们就说一说公孙弘放猪这件事儿。

## 公孙弘是哪里人

为什么要说公孙弘放猪？因为这事关公孙弘的籍贯问题。

公孙弘是哪里人？《史记》说得很清楚：“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齐”，即齐国故地。“菑川国”的位置、范围也很明确，都城在“剧”（今寿光东南纪台镇）也无异议。可是《汉书·地理志》载“菑川国”下辖：“剧、东安平、楼乡”三县，偏偏没有“薛县”。这就造成了今天公孙弘里籍的三种说法。

一是寿光东南说，二是昌乐说。两地为邻县，这两种说法暂且不论。还有一种说法是鲁国薛人，即今滕州市南说。依据是《汉书·地理志》载汉鲁国下有“薛县”，并据此认为“齐菑川国”是司马迁的失误。关于这个说法，清代学者叶圭绶在《续山东考古录》中已作评判：凡是笔误，不是音近，就是形近，菑川和鲁国，不管是音还是形，实在相差太远了，况且菑川前面还有一个“齐”字。所以一定不是古人笔误。

事实上，菑川国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汉武帝时菑川懿王还有“侯国十三”，直到汉宣帝五凤年间（前57年—前54年），菑川才最终只剩下了《汉书·地理志》中的“剧、东安平、楼乡”三县，成为最小的诸侯王国。公孙弘生活于公元前200年至前121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冬十月，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次举荐之中，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荐给长安朝堂。可以说此时的公孙弘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的姓名、籍贯才被世人所知。此时的菑川国并不是只有“剧、东安平、楼乡”三县，所以太史公说公孙弘是“齐菑川国薛人”应该没有错。

那么薛县在哪里呢？清嘉庆《寿光县志》载：“盐城在县城西北六十里，清水泊侧，俗名霜雪城，以寿光故城也”。盐城，又名霜雪城，位于今天寿光双王城生态发展中心。此地西汉时北濒于海，南临剧县，西南去临淄，东南去北海郡都不远。齐、菑川、北海皆可统辖。《续山东考古录》卷十六云：寿光县北六十里有霜雪城，疑“雪”为“薛”之

讹。

这当然是推测，但这个推测，相对于其他说法还是更令人信服的。寿光双王城一带为濒海重盐碱地，过去人们形容这里是“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广袤的土地泛着白花花的盐碱，就像是秋后下的一层霜雪，用“霜雪”命名其地恰如其分。按此推测，“薛”或为“雪”之讹。

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到公孙弘“牧豕海上”，也就是放猪的事情了。公孙弘年轻时曾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被免职。失去工作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在海边牧猪。很多人注意到了“海”，从而否定了不濒海的鲁国薛县（今滕县东南），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 公孙弘到底在哪儿放猪？

薛县“出局”之后，咱们还可以从放猪这件事继续推测。公孙弘放的是猪，而不是牛羊。猪这种家畜不能远距放牧，因为它们腿短、大腹便便，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所以牧猪一定不会离家很远。试想，如果公孙弘的家乡在寿光东南部或者昌乐，赶着猪就是不吃晚饭走路一天也到不了海边。所以公孙弘的家乡濒海，“薛县”在寿光北部，公孙弘应当是寿光北部人。至此，寿光东南说和昌乐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 放的是谁家的猪

有的人可能会说，公孙弘难道不会给他人牧猪吗？此说有理。公孙弘一定是给他人牧猪，因为他家贫，没有能力大规模养猪。但是公孙弘曾做过薛县的狱吏，在家乡是有一定关系和地位的，谋一份工作并不难，而且公孙弘非常孝顺，“养后母孝谨”，所以大概率不会远走他乡牧猪。

这又引出另一个话题。从考古出土大量的汉代陶猪和陶猪圈说明，汉代是推崇养猪的，但大多是一两头的规模。大规模养猪的专业户也有，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泽中千足彘……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彘就是猪，千足彘可不是千头猪，一只猪有四只足，千足彘即二百五十头猪。这些人的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史记·货殖列传》还介绍了一个叫刀闲的大商人。齐地的风俗是看不起奴仆，而刀闲不仅重视，还让他们帮自己经营渔盐生意。有的奴仆出门车马如龙，与郡守、国相交朋友。刀闲依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财富。连刀闲的奴仆都能够结交郡守、国相，刀闲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寿光自古盛产食盐，公孙弘的雇主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位经营渔盐生意或者从事养殖业的大商人。菑川国能够两次举荐公孙弘，特别是在第一次被罢官的情况下，第二次仍选择他，应该不是菑川国无出其右者，而是很可能沾了那位富豪雇主的光。